

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 中國佛學研究論文大系 14 洪修平



佛光文選叢書五五一四

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嚴北溟教授

作者／洪修平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月



佛光文選叢書

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佛光

5514

□著者□洪修平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月初版

有版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發行人□星雲大師

□出版者□佛光出版社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寺 電話(07)六五六一九二一—八

□流通處□佛光山寺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寺 電話(07)六五六一九二一—八

佛光書局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27號 電話(07)二七二八六四九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72號九樓之14 電話(02)三一四四六五九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188號二樓 電話(02)三六五一八二六

□印 刷□日盛印製廠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七九九五六六七

□定 價□二〇〇元

□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五號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如有缺頁或製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序

任繼愈

佛教從西漢之際經西域傳入內地，爲了適應中國社會環境，逐漸與中國傳統封建宗法文化融合，從而得到發展。南北朝以後的佛教文化已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釋迦氏也被中土羣衆接受並奉爲聖人，與中土孔子、老子並稱「三聖」，佛教與儒、道兩教並稱「三教」。因而佛教史也就是中國文化思想史的組成部分。

南北朝時，中國有了大量漢譯佛經，隨著對佛經的不同理解和解釋，形成了許多學派。到了隋唐時期，不少學派發展成爲宗派，禪宗屬諸多宗派之一。各宗派都有自己的特色。唐中期以後，宗派爭鳴，禪宗以其獨特的傳教方式及其僧團組織方式得以發揮其特殊優勢，成爲勢力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宗派，影響不但遍及全國，還遠播海外。

宋代理學（我稱之爲儒教）興起，佛道兩教的宗教哲學部分已被儒教消化、吸收，隋唐三教鼎立的形勢不復存在，表面上佛教好像衰落了，事實上佛教的心性論及其宗教修養方法都被儒教移植過去，成爲儒教的核心。儒教學者自稱遠紹洙泗，並得堯舜禹的心傳。我們不能說儒教不受孔孟影響，但是更應指出儒教是經過佛教，特別是禪宗洗禮的孔孟之學，不是漢唐以前的孔孟之

學。儒教是接著隋唐佛教、道教的心性之學發展起來的，儒教與佛、道兩教不是唱的對台戲，而是連台戲。

禪宗的開創者，早期的如菩提達摩，後來的如弘忍、惠能，在當時都不算聲光顯赫的大人物，他們與政府上層集團來往甚少，沒有得到政府的特別照顧^①，都是白手起家。只有北派禪宗神秀、普寂、義福曾受到皇帝的禮遇，奇怪的是受到禮遇的北派後來發展不大，倒是那些遠離政治中心，活動在社會下層的一些支派，卻風靡全國，成為顯學。宋以後的學術界常用禪學指佛學，稱某人思想近禪，即指其人學術有佛教思想傾向。

禪宗在中國宗教界、思想界影響深遠，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有兩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理論上講明心見性。禪宗的宗教哲學，抓住了當時時代思潮的中心問題。中華民族的認識史，從魏晉開始即開展本體論的探討。此時的佛教般若學的六家七宗與玄學本體論相呼應，由本體論進入心性論，是邏輯發展必然的趨勢。佛教涅槃學繼般若學而興起，佛性問題引起中國學術界的重視。佛教界關心的熱門話題，從般若學到涅槃學，恰恰與中國哲學史的邏輯發展同步進行，都是由本體論向心性論轉移。禪宗大發展時期各宗各派無不涉及心性問題，把心性論的研究提到新的高度，不但充實了禪宗的理論，也加深了中國哲學史思維的深度。

第二、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秦漢開始，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政權，直接統治著千

千萬萬小生產者——一家一戶的個體農民，這些個體農民構成了社會基層細胞。除禪宗外，佛教各宗派都靠收租過活，不斷引起與政府爭勞力、爭租稅的矛盾。只有禪宗保持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他們的原則是自己勞動，自己消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從而在經濟上立於不敗之地。

第一、第二兩點又是互相融通，互相支持的。禪宗繼承了中國的佛性論，把問題推向深入。比如頓悟與漸悟的關係，唐朝禪宗講的頓漸關係比道生時期的頓漸關係有所發展，把佛性頓悟說由本體論的「與道冥符」，發展為心性論的頓悟理論，把頓悟說看作心性解脫的妙道，由本體轉向內心，從本體論的頓悟轉向心性論的頓悟。

照唐人記載，禪宗流派不下十幾家，細分起來當不止這麼多。不論他們之間教義有多少分歧，但禪宗的共同信念是「自我解脫」。這種自我解脫雖有時借助外緣啟發，所謂機鋒、話頭，但關鍵的一步全憑自修自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別人的教導千萬遍，不論經典上怎樣說得分明，都代替不了自己的切身體驗。這種「自我解脫」、切身體驗的宗教觀，恰恰是中國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反映。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不假外求，正是小農經濟現實生活的自我

① 陳、隋間創建的天台宗智顛得到國家調撥租稅及勞力補助；玄奘、法藏譯經，費用由國庫開支，譯出佛經得到皇帝作序，借以擴大影響。

滿足精神境界的折光反射。佛教宗派眾多，只有禪宗的自我解脫觀保存的農民宗教意識最多。它把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緊密地結合到禪宗僧團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中來。這一變革，使得中國佛教與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結構進一步取得協調，從而獲得更強的生命力。禪宗思想中國化，首先在於使生產、生活中國化，把小農經濟的機制運用於寺院經濟生活。其傳法世系，也力圖與中國的封建宗法制相呼應，寺主是「家長」，徒衆是子弟，僧衆之間維持著家族、父子、叔侄、祖孫類似世俗的世系關係。禪宗多次公佈它自佛祖以來的傳法世系。爲了論證他們的世系有據，不惜靠杜撰去填充千餘年連印度也搞不清楚的世代法嗣繼承關係。旁觀看來，未免可笑，而且是徒勞的，在當年禪宗的信奉者卻以十分嚴肅的態度來對待這個根本不存在的傳法世系表。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來中國封建門閥世襲譜牒之學的影響的反映。沒有譜牒作爲根據，在朝廷就做不了官，僞造譜牒的還要治重罪。唐代一再頒發氏族志、姓氏譜，都是爲了門閥士族的需要。這種現實也反映到佛門中來。我們明確了一條原則：我們不能用宗教說明歷史，而應當用歷史說明宗教。

近來喜讀青年學者洪修平先生的《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一書初稿，作者廣泛搜集國內外有關禪宗史資料，充分利用前人成果，又超出前人的局限，經過獨立分析，斷以己意，摒棄前人慣用的羅列史實、客觀描述的方法。

禪宗早期各派流傳下來的資料不多，不同於禪宗後期的資料連篇累牘，不可勝收。作者善於利用有限資料，做出合理的論斷。前人研究成果，不出於一人一時，各有獨特的見解，其間難免有互相補充的地方，也有相互抵牾的地方。作者用客觀的態度，分析其分歧的原因，然後作出合理的結論，立論穩妥而有一定的說服力。洪修平先生這方面做得很成功。

禪宗的產生發展不是孤立的社會現象，對它的研究剛剛開始，涉及的問題不少。比如說，與禪宗並時的，有過交涉的其它學術流派和宗教流派，還有與它同時的道教的活動等等，尚有未發之覆，有待大家深入探索。當然，要求在一篇文章或一部書中解決很多問題是不可能的，也沒有必要。洪修平先生的這部著作，已完成它應有的任務。同時，給後來研究者留下充分發展的餘地。要把一門學科的研究推向深入，擴大它的研究範圍，不是少數人，少數課題能解決得了的，要羣策羣力，從多角度進行研究。有了好的開始，就不愁沒有新的成果。我高興地應洪修平先生的囑託，爲此書寫這一篇短序。

序

嚴北溟

洪修平博士的專著《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即將出版，我爲他感到高興，也爲我國佛學研究新一代的崛起而感到欣慰。

洪修平博士頻年研習中國哲學史，早具一定根柢。我曾參加過他在南京大學的碩士論文答辯，知其用功刻苦，對魏晉玄佛合流以及重要的佛學家僧肇的思想作了認真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創見。在復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更埋頭鑽研佛教哲學，把重點擺在禪宗思想特點的形成以及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方面。由於他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同時，又充份佔有了資料，特別是下苦功夫閱讀佛教原典，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因而寫出了這將近三十萬字既有分量、又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學術專著。

這部禪宗研究專著繁徵博引，對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作了條分縷析的深刻闡述，論證充分、可靠。它的重要特點之一是視野開闊、視角新穎。作者堅持歷史的與邏輯的辯證統一，從外來佛教與傳統哲學文化的相互關係中探討了佛教的中國化過程，並從佛教中國化這個歷史大背景下來考察禪宗的形成與分化發展，通過對初期禪宗思想系統而全面的研究，分析了禪宗的中國化特色

及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揭示了傳統文化在中外思想的交融中不斷發展演變的歷史與規律，這對於國家新文化的建設，當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作者閱讀和參考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和近代中外學者的多種撰著，有選擇地吸收國內外以往的研究成果；尤其根據近代發現的敦煌本《壇經》等禪宗史料與碑銘石刻等記載，對東土五祖、法融牛頭禪、神秀北宗禪與惠能南宗禪等初期禪學思想作了深入而細緻的分析，正本清源，爬羅剔抉，釐清了從印度禪學到中土禪宗思想發展以及名相範疇演變的線索，並對禪宗在發展過程中與佛教其它宗派理論的相互影響，特別是與中國的方術迷信、儒學以及老莊玄學的關係，作了系統的闡述。發前人所未發，對學術界長期爭議不決的某些問題，提出了自己新的創見，對國內外禪宗研究中的薄弱環節，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開拓性的觀點。

如針對以往大多數學者片面強調禪宗為中國傳統思想的產物而對禪宗來自佛教本身的思想淵源的研究反而流於空泛疏略的弊病，作者著重指出，禪宗的思想核心及其立場、方法都沒有超出佛教的範圍，但它鎔佛教各家學說於一爐，並大量攝取儒道等傳統思想的內容與方法。因此，禪宗本質上是「淵源於外來的佛教而形成於傳統文化之中」的佛教中國化的產物。為此，作者對禪宗融攝儒道兩家而形成自身理論特點的過程，作了翔實細緻的分析，彌補了以往學術界在這方面的不足。

同時，作者認為，應以般若實相與涅槃佛性的會通，作為晉宋以後中土佛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禪宗亦即由此而產生，這就較好地回答了學術界長期爭論的禪宗究竟以般若性空為理論基點，還是以佛性妙有為理論基點的問題。而對於早期印度禪學與中國禪的異同，達摩禪的中國化，弘忍門下各派的分化以及南北禪宗對立的形成，惠能對前人思想的繼承與變革等重要問題，書中亦不乏深刻洞見。如肯定禪宗在思想上與組織上，弘忍已完成初創；認為見性成佛、頓悟成佛是弘忍門下各系的共同思想；認為弘忍、神秀偏重於楞伽心性論，道信、惠能則偏重於般若無所得；提出惠能思想中透露出唯當下現實之心的本體論預設，不能簡單以主觀唯心主義或客觀唯心主義去概括等等。此外，對法融牛頭禪及農禪並作等許多方面的研究也都填補了國內學術領域的空白，其中不少觀點是很有深度的。

當然，就禪宗對我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而言，除哲學外，還涉及到文學、藝術和社會政治思想等方面，書中若能對此簡單而又具體地加以論證當更好。可能因限於本書的題旨範圍或時間關係而未能對此有所發揮。但總的來看，正如國內第一流專家學者在評審該書時所指出的那樣，本書「觀點新穎、見解深刻、資料豐富、論證周密、結構嚴謹、語言流暢，可彌補國內學術界對早期禪宗思想系統研究的不足，對推進我國這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價值。……與國內同行相比已進入先進的行列。」我願將它推薦給各位讀者，我相信此書的出版對推進我國禪宗史和禪宗思

想史的研究必將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九八九、五、二十七

目錄

序／任繼愈	1
序／嚴北溟	6
內容提要	1
緒論	7
第一章 人心與止觀——禪宗思想溯源	25
第一節 早期禪學概觀	28
第二節 般若與禪觀	43
第三節 人心、佛性與解脫	66
第二章 心境與心性——達摩禪之展開	101
第一節 藉教悟宗與安心符道	106
第二節 身佛不二與息妄顯真、任性逍遙	118
第三節 隨心自在、無碍縱橫	132

	第四節	東山法門與禪宗初創	162
	第三章	無心與觀心——南能北秀之分化	203
	第一節	心境本寂、絕觀忘守	206
	第二節	南北禪宗對立之形成	221
	第三節	觀心看淨、方便通經	250
	第四章	佛性與實相——曹溪的頓悟禪（上）	283
	第一節	惠能與《壇經》	286
	第二節	以空融有、空有相攝	312
	第五章	識心與見性——曹溪的頓悟禪（下）	371
	第一節	即心即佛、自在解脫	373
	第二節	識心見性、頓悟成佛	395
	第六章	禪宗與中國哲學	435
	第一節	直顯心性與理事圓融	437
	第二節	三教合一與農禪並作	457
	第三節	傳統哲學發展的環節	471

3 錄 目

附錄	483
主要參考書目	492
後記	499

內容提要

本書從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探討了禪宗的形成、分化與發展，並通過對初期禪宗思想的全面研究，探討了禪宗的中國化特色及其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的地位與影響。全書除緒論外，共分六章。

在緒論中，主要談了佛教中國化的途徑與階段，並對本書的基本觀點與方法作了說明。作者認為，從思想理論上看，佛教的中國化大致通過了方術迷信化、儒學化以及老莊玄學化這三種途徑。這三個方面是相互聯繫、並存並進的，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人與不同的思想體系中，又各有所側重。作者把佛教理論中國化的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從佛教初傳到兩晉時期，這是佛教中國化的開始階段；第二，從南北朝到隋唐五代，這是中國佛教走向獨立發展與鼎盛時期，也是佛教中國化的完成階段；第三，從北宋到近代，這是中國佛教的發展由盛而衰的階段，佛教的中國化也表現出了不同於以前的種種特點。

1 內容提要

第一章從歷史的與邏輯的統一中探索了中國禪宗的思想之源。全章共分三節，分別對早期禪學的特點、魏晉般若學對禪學的改造以及南北朝心性學說對禪宗的影響等作了研究說明。第一節

主要探討了安世高系的小乘禪數之學，並根據僧傳和經序中的有關記載，概括了羅什來華之前中土禪學受社會歷史條件制約而形成的種種特點。第二節對道安、慧遠、支道林等人以大乘般若學貫通禪學以及羅什、僧肇、僧叡等人的般若空觀與中道方法對禪宗的影響分別作了探討，特別指出了僧叡把般若空觀與涅槃佛性結合起來理解的思想傾向。第三節分析了佛教解脫論的特點，探究了印度早期佛教從人心的解脫出發，對淨心染心所提出的各種不同的觀點以及大乘佛教基於「心性本淨」而對心性問題所作的理論發揮。重點論述了在印度不占主要地位的大乘如來藏思想在中土的盛行及其原因。對於竺道生的思想特點以及南北朝時期種種佛性論的共同傾向及其對禪宗思想的影響，也作了專門的研究。

第二章論述了達摩禪的展開與中國禪宗的初創。作者認為，從達摩禪到惠能禪，經歷了一個由外境到內境，由心注一境到心境泯然的演變發展過程。東土五祖的傳承之真偽雖不能作最後肯定，但在思想上，他們確實是有相通之處的。本章分為四個部分，根據新發現的敦煌本有關禪宗資料以及其它一些碑銘石刻的記載，分別對達摩的「二入四行」、慧可的萬法皆如與身佛不二、僧璨的《信心銘》、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以及弘忍的《最上乘論》（即《修心要論》）作了具體的分析與研究，探討了禪宗的形成，認為對般若實相說與楞伽心性論的融攝是達摩系禪學思想的基本特點，這與中國化佛教發展的總趨勢是相一致的；其中，慧可、弘忍與神秀偏重於楞伽心